

中共最早的红色银行——兴县农民银行



刘少白照片

在抗日战争时期，兴县农民银行发行了“兴农币”，通过发行货币，发放贷款，有效地开展货币斗争，有力地支持抗日根据地生产建设。西北农民银行由兴县农民银行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又由西北、华北和北海三大银行合并而组建，由此可见，兴县农民银行是西北农民银行的前身，西北农民银行又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兴县农民银行为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刘少白时高兴地说：“好你个刘少白，一席话，一支烟，就从人家士绅们的口袋里把钱掏了出来，真不简单啊！你们发放农贷，办纺织厂，推动物资流通，也是好办法啊！”略作停顿，毛泽东深有感触地总结说：“我曾说过，全党同志都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如果我们的战士连饭也没得吃，衣服没得穿，边区人民的生活丝毫没得改善，何言抗日救国啊！”

刘少白奉党之命办银行。抗日战争初期，山西省钞大量涌入晋西北，面额大且不便交易，一些奸商趁机倒贩银元、法币，扰乱了金融秩序。为此，晋西北区党委决定，由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1937年11月，在兴县城内孙府前的院里召开首次银行董事会，会议推选刘少白担任银行经理，确定兴县农民银行为行名。同时，以“战地动员委员会”名义，采取董事

会组织形式，动员全县100多家富户捐款。刘少白以身作则先拿出多年的积蓄，然后去动员牛友兰、刘训山等捐款，结果牛友兰一次就捐献了2.3万元白洋、150石粮食，最后共筹集3万多元白洋、700多石粮食，为建立兴县农民银行筹措了基金。同年11月底，在兴县城内宣布银行开张，刘少白亲笔题写“兴县农民银行”门牌，并撰联：“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银行开办月余，就开始发行钞票，简称“兴农币”。从银行成立到扩大两年半时间内，发行贰角、伍分、伍角、壹元、伍元5种版别的票券，先后三次共批量印发了15万元票子，银行资金80%作为军需用品，通过发行货币支持抗日。1938年2月，日军实施对晋西北大扫荡，兴县农民银行随军撤离县城20多天，后搬回兴县县城。1940年5月10日，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兴县农民银行停业并将基金及积累移交西北农民银行。从1940年到1949年12月，先后印刷“西农币”26种币值12000亿元，为恢复发展西北解放区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1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统称为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银行、北海银行三大银行合并，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作为原始发起行，成为了新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基石之一。

中国红色银行事业创始人刘少白是一位集贡生、士绅、共产党人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毛泽东选集》中，曾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位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位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毛泽东说：“刘少白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刘少白，1883年6月30日出生于兴县黑峪口村，1908年考入山西大学堂攻读法律，接受新学。辛亥革命爆发后，率先剪掉辫子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积极倡导白话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与牛友兰在兴县创办了多所中小学，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

献。土地革命时期，在白色恐怖下，他凭借自己的身份营救过河北省委书记刘锡五等中共早期领导人。1931年，为营救王若飞等被捕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协助120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他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1940年1月，兴县农民银行改为西北农民银行后，出任西北农民银行行长。“西农币”大量流行于晋西北和内蒙地区。第一批被刘少白用墨迹涂改过的票子，承载了一段艰难岁月的故事，使得刘少白改过的纸币，成为国内钱币收藏界难得一见之珍品。1942年，当选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与牛友兰在兴县城关创办了蔚汾纺织厂。1949年9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还担任山西省政府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华北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68年12月10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

在山西近代革命史上，刘少白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首届山西省议会议员，也成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提议创办的兴县农民银行，被誉为中国红色银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刘少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一家红色银行，一张“兴农币”，一位银行创始人，在吕梁山美丽邂逅，演绎了一段金融抗战故事，传承了一段红色革命记忆。如今，兴县农民银行虽已成为历史，“兴农币”亦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兴县农民银行遗址，模糊泛黄的“兴农币”，仿佛都在诉说着晋绥抗战革命故事，当年创新的金融董事会组织形式、基金融资模式，也已成为新时代企业改制的借鉴模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与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与使命。兴县农民银行因吕梁而彰显了一段艰辛曲折的金融史，吕梁因兴县农民银行书写了一段令人骄傲的奋斗史。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



兴县农民银行人民币、西北农民银行人民币（馆藏文物）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家属在郭家塔村居住点滴

□ 郭时键

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我党及延安根据地的人员全部撤退。其中西北野战军、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领导的部分家属一百多人住在临县从罗峪镇郭家塔村中，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同志的爱人马淑良带队。村民自发腾出房子，捐出日常用品，帮助部队家属安置，并慰问伤员，组织担架队转送伤员到医院，为家属提供了当时最好的居住条件，为过往伤员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当时西北野战军随彭德怀在陕北打仗，高等法院机关住在五里以南的从罗峪村。

当时住在村里的全是妇女和孩子，只有一个从天洪村请来的担水的男子。1948年正月，村里组织闹秧歌，这些妇女中爱好娱乐的全部加入到扭秧歌的队伍，其中有一名丁秀英的扭得最好，而且会演唱，她曾与

本村村民李宏喜搭对进场表演，人人叫好。家属们与老百姓相处很融洽，郭家塔村郭全喜的母亲与一位女家属关系好，送了一点地里的蔬菜给她，她返送了好几斤白面和其它粮食，家属们决不让老百姓吃亏。据长辈郭丕汉回忆，家属中有一个长得最漂亮的叫张绳清，也参加村里的扭秧歌，在秧歌群中十分出众。但不久后，张绳清得了一场天花病，病愈后脸上起来一脸疤，成了一个疤子，这件事在全村人心中留下长久的记忆。在村民郭昌宁家院里住一户家属，带着一个小男孩叫黑猫，黑猫常和村里的小男孩们玩耍，口袋里经常装着干馍馍，村里的小男孩们羡慕得不行，就围住他喊叫，让他拿着干馍馍“冒高高”，他一冒高高，一群孩子就抢着吃干馍馍，他高兴，孩子们也高兴。在村民谈照家院里住一户家属，人们起初给她家一点蔬菜，但这户家属当时非给送菜人钱不行。除了当场给钱之外，这家还要事后送一些白面馍馍等好吃的回馈，人们后来就不

敢再送了。

这些家属们，有好几个在村里生下了孩子，其中有一个小孩儿叫白介民奶水不足，由房东郭九旭的母亲用小米粥抚养了几个月。到了1998年6月，已经50岁的白介民，从广东回到郭家塔村探望生他养他的“故乡”。

白介民对郭家塔村民说：“民国36年农历二月初，我母亲大着肚子，跟着队伍从黄河对岸的陕北佳县过来，身边带着两个孩子，男娃五岁多，小女子三岁。孤儿寡母，落脚在郭家塔，农历四月下旬，在你们谁家生下一个男娃。”

白介民在《皇天厚土永不忘》一文中写道：“母亲生前讲过，当时奶水不足，只能用小米粥上面那层没有米的‘粥皮’喂养嗷嗷待哺的我。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集团攻占延安。父亲随彭德怀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前线作战，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中央后方机关撤出延安辗转陕北，脱下军装，乔装潜伏，化整为零，与敌周旋。

边区乡亲真情相待，收留掩护着这些解放军的婆姨娃娃。”

“来郭家塔村居住的，是解放军的家属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家属们，由马明方的妻子马淑良带队（马淑良解放后曾是中国科学院基建局副司级离休干部）。母亲回忆，在郭家塔的大半年时间里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一个二三百人的小村村，一下增添了一百多人吃饭，这对土地贫瘠的晋西北农民来讲是沉重的负担。但他们倾其所有，母亲与房东相依为命。”

白介民感慨地写道：“风也牵挂你，雨也惦记你。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你。”“我来的时候，你倾其所有。你盼的时候，我在哪里！你望眼欲穿的时候，我用什么来报答你。”

白介民最后写道：天下乡亲，亲如爹娘。养育之恩不能忘，高天厚土永不忘！

